

# 故国与新邦

## ——民国初年陈三立诗文中的遗民书写

李开军

**内容提要** 民国初年的陈三立，生活在惊惧、愤怒之中。他眼中的民国，战乱频仍，纲纪沦落，道消雅废。他时常梦回故国，对溥仪亦欲“魂依”，虽未参加“丁巳复辟”之役，但恢复之志隐约在诗文之中。

**关键词** 陈三立；民国初年；遗民书写；恢复之志

尽管民国三十二年（1943）吴宗慈撰写《陈三立传略》时，胡先骕反对以“遗民”称之，以为“有违先生之志”<sup>①</sup>，吴宗慈仍以“甘隐沦作遗民以终老，祇自尽其为子为臣之本分”<sup>②</sup>一句，来论定陈三立进入民国之后的立身出处。今人的研究基本认同吴宗慈的判断，认为陈三立乃是民国初年海上遗民圈中之一人，其中孙虎2010年的文章，引吴宗慈“高不绝俗，和不同流”一语，作为对陈三立遗民心态之概括，呼应了吴宗慈“（陈三立）忠清”又“赞成民国”的提法<sup>③</sup>。但刘洋2012年的博士学位论文则实际上对“赞成民国”有所修正，他分析了陈三立民初诗歌中“劫烬”“鬼趣”等意象的毁灭隐喻，和对现实世界黑暗荒芜之描写，有力地说明了陈三立此时的履劫心态和对于民国“新世界”的情感拒斥<sup>④</sup>。不过总体来看目前的研究，在对陈三立“遗民”身份的理解上，大体未脱吴宗慈的笼罩，或者顺延申说，强调文化遗民身份<sup>⑤</sup>，其实仍有未发之覆；而对于其诗文中遗民书写的发掘，也有浮光掠影之嫌，有待深描细写的地方正自不少。本文即试图在细读陈三立民初诗文作品的基础上，结合他的传记材料，对上述问题做进一步探讨，以期理解他在历史巨变时刻的出处选择。

### 一 民国的日常

陈三立对于民国的感情立场，自然与他的个人及家庭生活遭际密切相关。当宣统三年（1911）

八、九月“武昌难作”“相煽继变”之际，南京头条巷陈家的散原别墅刚刚筑成不久，然而“移居席未暖，烽燧已在目”，遂带着生病的女儿及其余十几口，趁夜乘轮避往上海租界。作为一家之主的陈三立，在两年之后的除夕诗里这样述写他的“转徙”“寄命”之感：

惊鹤起将雏，下堕涨海侧。巧击谢弹丸，四顾戢羽翼。猥脱標摇枝，樊笼聚而食。羈栖三改岁，此日又向毕。<sup>⑥</sup>

诗人像一只受惊之鹤，带领群雏，栖落海边。“惊”字极写事变初发时的心态，“堕”字则将身体不由自主之状淋漓写出。“四顾”写出“惊鹤”东遮西挡保护家人之后，虽暂得戢敛羽翼，却仍然紧张不安的神态。“標摇枝”，南京旧居也；“樊笼”，上海寓所也。然而枝虽“標摇”，终是旧巢；租界得食，毕竟“樊笼”。诗人虽有聚食之安，但对“羈栖”租界的栖遑和不满溢于言表。

转徙之际的惊惧不安，一直在陈三立的心里挥之不去，他将自已视作“横穷海”的“带霜疮雁”、“话旧都”的“登俎鱼虾”、“惊弓湿羽翰”的“辞群雁”等<sup>⑦</sup>，也常用动词“悬”来呈现动荡无着的感受，更在六十生日时，把自己定格为“诉哀篱壁一秋虫”<sup>⑧</sup>。秋风已深，秋虫即僵，面对生命的最后时光，恐惧和哀伤可想而知，它只能伏于篱壁，阵阵哀鸣。通过“秋虫”这一意象，陈三立凸显了自己内心的哀伤和无可如何。

在“殃祸塞坤轴”的时代，陈三立托身租界，然而“夷市俨雷池”，只是“庶几莫予毒”而已，

并非一处令人精神放松、心灵安顿的所在。所以这一时期陈三立诗文中，常常临眺旧乡。他甫一至沪，“旧乡”之情已经油然而生。当他遇到杨增萃，便想起“承平”之时一起“观赛石头城”“仕女嬉游”之情景，而如今却是“魂翻海市嘘精魅”了<sup>⑨</sup>。在沈曾植寓楼看到汪洛年所写《山居图》，思绪一下子飞到青溪旁的散原别墅，而因为遭遇“崩离”，现在“溪上宅”只能“荒却”<sup>⑩</sup>。羁栖沪上的第一个中秋到来，仰空对月，陈三立写道：

暖人一片青溪月，隔岁偷看向海隈。鬓底轮蹄喧叠浪，镜中楼观护纤埃。毬场弄影虫声去，笳吹飞愁雁点埋。今夕何年更何世，厌厌羁绪对衔杯。<sup>⑪</sup>

“青溪”是“承平”时游乐之水，散原精舍即筑于其旁；“海隈”乃当下寓楼所在，是“庶几莫予毒”的“夷市”。然而“海隈”夜空中的明月，在诗人眼中却是“一片青溪月”，以幻为真，诗人的心思清晰可见。“暖人”写出“青溪月”的温宛亲切，“偷看”则活画出诗人的怯怯心态。接下来4句，从视听两个方面写“海隈”此时之景象：轮蹄、楼观、毬场、笳吹。“虫声去”，意味着时序变易；“雁点埋”，愁绪里开始引出归思。这样，最后喷薄而出的“今夕何年更何世”的置问就显得十分自然，而“羁绪”一词不但揭示全诗主旨，同时也呼应了“青溪月”“雁点埋”等描写，更回答了为何会有此一问。此问答案显而易见：现在是1912年的民国，并非“宣统四年”的“故国”。

对“旧乡”的惦念时刻萦绕在陈三立心间，但直到民国二年（1913）春，陈三立才试着暂回南京，而真正的举家回迁，则要等到民国四年（1915）夏。不但有家不能回，而且有坟不能上。之前几乎每年清明、冬至两节，陈三立都会赴江西新建西山省墓，洒扫祭奠，墓庐告语，但“国变”后，烽火神州，战乱频仍，与亡父的墓庐交流大受阻隔，在“荐物阻兵戈，三岁霜露隔”之后，民国三年（1914）清明，陈三立终于得以抵达西山峭庐，向父亲倾诉家国所发生的一切。

因此，民国最初的三四年里，陈三立一家基本上被困在租界这个“异乡”里。租界整体上来看是安全的，但除此之外，陈三立对租界并不满意。在他眼中，租界不仅仅是一个“厌纷阓”的“逋逃藪”“傀儡场”，更是“蛇虺窟”“雷池”

“秦坑”。对于乱离时代羁栖租界的感受，陈三立在“国变”当年的《除夜》诗里有集中的表达：

亘古存残夜，孤呻有小楼。灯扶浆担去，埃杂海光流。逃世吾宁及，攀天梦亦休。夷歌暖杯酒，摇入万方愁。<sup>⑫</sup>

除夜是一年的最后一天，当然是“残夜”，不过宣统三年（1911）的最后一天有些特别，因为5天前，清室宣布退政，这意味着一个时代结束了。所以陈三立将此“残夜”置于“亘古”这一背景上：绵延的时间长河中，只剩这最后一晚。而在空间方面，诗人置身于“小楼”之中，它周围是广漠漆黑的世界。面对无限的时间和有限的“残夜”、广阔的世界和困守的“小楼”，诗人唯有“孤呻”。在这前二句中，诗人通过时空描写，为我们构建出一个充满压迫感的世界，时间、空间从四面八方挤压过来，“残”“孤”“小”——似乎诗人已经艰于呼吸了。接下来的颌联，写寓楼目光所及：灯光扶掖着卖浆水的渐渐远去，尘埃混合着海水的波光流动。这是一幅宁静温馨的画面。如果说开篇诗人充满紧张的话，至此情绪似有舒缓。但颈联再次紧张起来，诗人以激急直白的十个字，否定了自己人生路向的两种可能：逃世隐居“我”哪来得及，攀天大梦也就此破碎。“我”何去何从？——只能困守于此。此二句直截表达心中所想，是整首诗最高亢的部分。尾联再次平复下来：“夷歌”温暖着“我”手中的这杯酒，又带来万方哀愁——诗人终究未能“躲进小楼成一统”。这首诗通过将租界构建成一个压抑性的世界，在在彰显了“民国”给诗人心灵世界所带来的紧张。

在这样一个有家不能归，有坟不能上，逃世已无及，攀天梦又碎，时时处处紧张不安的民国，诗人何为？

访友。“国变”后，沈曾植、樊增祥、李瑞清、瞿鸿禛等旧朝人物，都避居沪上租界，相似的身份，共同的遭遇，使大家在情感上自然容易亲近。交流时局信息，倾吐乱世之际的愤懑，讨论艰危中的出处，在日益严酷的世界中，人们相互支持和慰藉。乱世之中，气类相慕，访友晤谈，可能是获取慰藉的特别重要的渠道。

宴集。虽是时局动荡，但租界毕竟安稳，且流人多有闲暇，所以宴集之事时常有之。乱离之

中，唯求一饱，亦即陈三立所云：“吾侪狎丧乱，贱儒嗜饮食。兴亡一瞬过，不涓杯中物。”<sup>⑮</sup>丧乱兴亡，非所掌控，饮食杯酒，暂以忘忧。仅民国元年（1912），从陈三立的诗歌来看，他参加的宴集活动就达二三十次，“兴亡”自然是此种宴集上的话语主题。

结社。“国变”后海上寓公，本多诗人，既无公务缠身，遂生啸歌废坠之惧，于是民国二年（1913）二月，海上诸老创立超社。陈三立参加了26次社集中的绝大部分活动，每次都有应题之作。民国四年（1915）正月，瞿鸿禛以超社成员中颇有出仕民国者，遂于二十五日重开逸社，尽管因为民国四年（1915）夏即迁回金陵，陈三立仍然参加了六七次逸社雅集。逸社的活动方式与超社并无根本区别，仍以分题赋诗为主，只是似乎更强调诗社在遗民气节方面的认同<sup>⑯</sup>。

游园。在民国四年（1915）夏携家重返金陵之前，沪上园林是陈三立足迹常至之处，张园寻春茗坐，徐园踏雪，六三园看菊，樊园对杏，等等，都是一年四季不错的节目。仅愚园一地，就曾“三岁名园十数过”。而哈同园梅花，深得陈三立喜爱，历年均往探赏。风景豁目，并以销忧，然而有时陈三立却“独嗟非我春，摘枝乱愁思”<sup>⑰</sup>。

题辞。“国变”避居上海之后，为他人题辞成为陈三立生活中常有之事。相较于民国之前，题辞数量大为激增，这大概与流人汇集沪上有很大关系。这些题辞中，大多为题图之作，如汪洛年《山居图》、刘廷琛《潜楼读书图》、朱祖谋《归鹤图》、吴学廉《鉴园图》等；其次为书迹，也有别集、遗像之类。请题者大多为朋旧，所以陈三立写得格外用心，尤其是常常浸满对“换世”的感喟和对“新世界”的批判，有他个人的情怀在。

饮酒。陈三立是一位喜欢饮酒的诗人，写及饮酒的诗歌俯拾皆是。民初居沪时，宴饮、社集之事颇多，觥筹交错，朋喧友啸，这是热闹的饮酒。蜗居独处，或是雨夜枯坐，或是月下望远，或是生日诉哀，或是除夕感怀，陈三立常是手持一杯，藉纾郁结，也暂以忘世，如其所自言：“垂老栖迟涨海陬，翻凭沉醉护幽忧。”<sup>⑱</sup>

坐雨。民初的陈三立，诗歌中多次写到寓楼坐雨，从避沪至民国四年（1915）夏还居金陵，约有20余首。如果说酒可以使人释放或忘世，雨

则令人压抑和愁苦。在入民国后第一首写雨的《雨夜》里，陈三立写道：“腥风移冻雨，狼藉作春寒。木榻邀灯语，瓶枝写镜看。老怀违气数，醉鬯隔栏干。谁问辞群雁，惊弓湿羽翰。”<sup>⑲</sup>腥风冻雨，酿作春寒，使“辞群雁”的处境更加艰难。陈三立在这样的雨中，常常要“孤尊”在手。看或听着楼外雨，饮着杯中酒，愁绪弥漫。大多数坐雨之作，都是这样一种风格，压抑的，愁苦的，反映的正是他的乱世心境。

在惊惧不安中，访友晤谈，宴集结社，游游园，题题辞，在酒里发抒着愤怒，在雨中郁结着愁苦：这就是陈三立诗文给我们呈现的他民国初年的日常。

## 二 作为异物的新邦

陈三立一切惊惧、愁苦、愤怒的来源，在于宣统三年（1911）八月十九日“国变”的发生和随之而建立的“中华民国”的存在。

在陈三立眼中，中华民国首先是一个“海宇鼎沸横干戈”的世界。“武昌事变”发生之后，革命军与清军的战斗在许多地方打响。十月四日进攻南京的战斗开始，仅一周，南京光复。陈三立应该是在光复南京的战斗打响之前，“窜匿”沪上的。不仅仅是陈三立，其他避居上海的师友如李瑞清、诸宗元、赵熙、沈瑜庆、易顺鼎、王乃徵、陈诗、杨钟羲、夏敬观等，也都经历了战乱。而师友遇难于兵间的消息也接踵而至：端方资州丧命，黄忠浩被斫于长沙，蔡乃煌遇难于广州，等等。此时上海《申报》《时报》等报纸中，各地战斗的消息连篇累牍。所以，民国初年前后的陈三立，耳闻目睹，不外是战乱，清政府与革命军之间，军阀与革命军之间，军阀派系之间，混战不断，陈三立以“四海都成蟋蟀盆”喻之<sup>⑳</sup>，其诗文中随处可见以“兵气”“烽燧”“干戈”“兵戈”等，呈现诗人对战乱时代的整体感受，虽是泛泛言之，但像“送老有干戈”这样的句子，已然让人生出无限哀感。而陈三立笔下特别值得珍视的，是那些忆述战争、描写战争伤痕的细笔之作，比如民国二年（1913）春天还视金陵故居的系列作品。此次“奋身省新筑”，是辛亥避居沪上之后的第一次，阔别达两年之久的“新筑”散原别墅，

如今变成了这样：

入门成生还，踌躇顾室庐。凝尘扫犹积，荫藓侵阶除。几案未改位，签架稍纷拏。檐间新巢燕，似讶客曳裾。猫犬饥不还，帙落千死鱼。纸堆弃遗札，略辨谁某书。因嗟哄变始，所掠半为墟。长旗巨刃前，守者对歔歔。就抚手植树，汝留劫烬馀。<sup>①9</sup>

灰尘层积，苔藓满阶。几案虽未移位，书架却已杂乱。猫犬散去，死鱼弃地。朋友的书札散落纸堆，庐外的树木劫尽犹存。当年的“生意”“繁浓”不再，如今一派荒芜萧条。这是众多金陵人家的一个。诗人难免嗟叹兵变劫掠，丘室成墟。但好在人事虽非，城郭仍在，毕竟还有一个散原别墅供其瞻顾。乱后的金陵城如何呢？陈三立在《由沪还金陵散原别墅杂诗》里写道：

钟山亲我颜，郁怒如不平。青溪绕我足，犹作呜咽声。前年恣杀戮，尸横山下城。妇孺蹈藉死，填委溪水盈。谁云风景佳，惨澹弄阴晴。檐底半亩园，界画同棋枰。指点女墙角，邻子戕骄兵。买菜忤一语，白刃耀柴荆。侧踞素发母，拏婴哀哭并。叱咤卒不顾，土赤血崩倾。夜楼或来看，月黑燐荧荧。<sup>②0</sup>

散原别墅位于头条巷，东望钟山，濒邻发源于钟山西南麓的青溪。宣统三年（1911）十月十日开始的天堡城之战持续了30多个小时，死伤惨烈，联军折损官兵160多人，清军阵亡达700多<sup>②1</sup>。此即“杀戮”所指。南京诸战中，死难百姓也颇不少，所谓“妇孺蹈藉死，填委溪水盈”也。此皆言战时之惨烈。而战后，诗人以“邻子戕骄兵”一事，控诉革命军的残暴，只是以白描出之，但一字一句，令人心悸，又激人愤怒。

陈三立的战乱书写是持续的，总起来看，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战斗之惨烈；二、战争给百姓生活带来之破坏，包括生灵涂炭，丘室成墟等。他本人之遭际——窜匿海曲，有家难回，有墓难上，亦是拜战争所赐。因此，他的战乱书写，并不是旁观者的隔岸观火，而有着历验者的情感投入，故而“激急抗烈，指斥无留遗”<sup>②2</sup>。

在陈三立的民国观感中，可与战乱频仍相提并论的，是纲纪灭裂。前者来自对身外乱世的目睹耳闻，后者则关系到诗人的信仰世界，反映出诗人的深沉忧虑。他在诗歌中常说：

天纲日坠九维坼，倏忽揖让移征诛。  
圣法久殫残，人纲孰再造。  
季运坏纪纲，蝮蟥沸九有。<sup>②3</sup>

古文中类似的表述亦不胜枚举。其诗文中的“天纲”“圣法”“人纲”“纪纲”“纲纪”等，即所谓的纲常伦纪，包括维系国家秩序的思想、道德、制度等，具体而言如君权、忠节、慈孝之类，看似虚泛，实为传统士人阶层所信仰。在陈三立看来：“纲纪者，国家所由维系”<sup>②4</sup>，“维治不敝，曰纪曰纲。仁贤张之，道济运昌”<sup>②5</sup>。虽然纲纪摧坏不自民国始，但民国却是纲纪荡尽的时代：随着民主共和国家取代君主专制王朝，从前的一切“纲纪”已经无从附丽；加之各种“新说”“异说”“肤说”盛行，“纲纪”更无立足之地矣。

在“纲纪”诸说中，陈三立特别注重“忠节”。在他看来，“临难毋苟免，食其禄者忠其事”，乃“天地之大经，圣贤之遗则”，依违之际，人兽立判<sup>②6</sup>。但在“故国”“崩坼”之时，受皇恩、食奉禄之臣子虽众，“其能守死而图报者”却“凤毛麟角”<sup>②7</sup>，甚而至于“耆旧闻人靡从改操”<sup>②8</sup>，“士大夫冒耻骛利、悍然自以为得计、不顾其后”<sup>②9</sup>。这些人中，有不少陈三立的师友，如王闿运，应袁世凯之招出任国史馆馆长；民国初年一起诗酒酬唱的樊增祥、周树模等，于民国四年（1915）赴京入仕；同年，北京群儒赞成袁世凯称帝，缪荃孙、孙雄等成为江苏地方帝制劝进人；等等。对于王闿运，陈三立有“已费三年哀此老，向夸泉水在山清”之议；对于劝进众儒，陈三立则以“史家佞倖增新例，媵汝飞腾一辈人”斥之<sup>③0</sup>。其实，早在避居沪上之初，陈三立面对各地军队蜂起倒戈、高官不战而降的局面，即有“鸿毛轻死今安在”之问，随着“靡从改操”之事日益盈集，陈三立内心的愤怒、哀伤和忧虑可想而知。这种情绪，在民国九年（1920）应胡思敬之请所撰《南昌东湖六忠祠记》里有较为充分的表达。在这篇胡思敬誉为“不朽之作”的“祠记”里<sup>③1</sup>，陈三立饱含感情地写道：

窃闻临难毋苟免，食其禄者忠其事，天地之大经，圣贤之遗则，通之百世而莫能易者也。盖人之生也，有羞恶之心，有不甘不屈之气，根于性，立于义，发于诚，明于分，依之则为人，违之甚或自陷于禽兽。当大难

临不测，若皆泛泛然拱手委之，君谁与赖？国谁与扞？民谁与保？况一死有系于成败存亡之外者哉？五代之际，士大夫不识名节为何物，其托于是时者，如夔之缘标枝也，如萍藻之卷冲潦也，倏忽变灭，不足列有无之数。故欧阳公于其史最反覆伤之，引以为鉴。且非徒中国而已，彼环海之国不一，虽法制或歧，教俗或异，然使官吏不死职，将士不死绥，宁有存立盛强可指称者耶？吾国新进学子，驰观域外，不深察其终始，猥猎一二不根肤说，盛倡于纲纪陵夷、士气萎靡之后，以忠为戒，以死其君为妄，溃名教之大防，绝彝常之系统，势不至人心尽死，导而成蜉蝣之群、奴隶之国不止。为祸之烈，尚忍言哉？<sup>⑧</sup>

在这段文字里，陈三立高举“忠节”大旗，他认为“忠节”根植于人之本性，是区分人与兽的根据，而“君谁与赖？国谁与扞？民谁与保？”连环三问，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凸显“忠节”之于君、国、民的至关重要，并将我们带入王朝/民国更迭的历史情境中。接着以五代士人不知名节而倏忽变灭、环海各国持守忠节而存立盛强正反二方面佐证。“忠节”如此重要，但在“吾国”却被“新进学子”视为戒妄，所以陈三立充满了对未来“人心尽死”、国至奴隶的忧虑。这一段文字环环相扣，一气呵成，特别引人注目的是6处反问，强烈的语气背后是作者的愤怒和焦虑。与陈三立指出的胡思敬六忠祠之建意在讽世砺士一样，《南昌东湖六忠祠记》一文显然也是有为而作，它直接针对了前述民国初年“忠节”扫地的现实。

由于时代的荡涤，忠节、慈孝等“旧社会”的“纲纪”，成为民国“新世界”里的稀缺之物，所以陈三立总是不失时机地去“发现”纲纪灵光一闪的时刻，以为时代之楷模<sup>⑨</sup>；他甚至在一些着重“妇职母教”的女性传记、题赞里，于纲纪维系亦三致意焉。陈三立发现，在闺闱世界里，妇德不但依然保有旧日面目，甚至还出现了令男性汗颜的忠烈言行，是纲纪留存的一方净土，因此他有“人纲久扫箝，闺闱延一线”的感喟<sup>⑩</sup>。

民国初年，陈三立不仅目睹了纲纪陵夷，也遭逢到了“雅废儒林衰”。

民初是武夫党人当政的时代，陈三立多次批

评“治人之吏”拙于治术、不谙儒雅，感慨前贤之儒雅之风，“歇绝久矣”，叹息“运殊数极，大雅不作”<sup>⑪</sup>。即便到了民国二十一年（1932），陈三立仍耿耿于“崩坼”之后，“武夫持权”，“抚字亲民之吏，类以群不逞少年充之”，而“循良雅化之遗迹扫地以尽”，不复从前“政事文学备于一身”之儒吏的现实<sup>⑫</sup>。陈三立也注意到，曾经被奉为经典的传统典籍正日益受到人们的冷落：“自世之乱突蛇豕，士夫辍业弃故纸。但扞枵腹剿异说，坟籍不待秦火毁。”<sup>⑬</sup>民国初年人们沉迷于泰西“异说”，“溺而不返”，且有“不深察其终始，猥猎一二不根肤说”之弊，所以陈三立担心，不待秦火，必有“典舆眼底飞灰尽”之一日<sup>⑭</sup>，而以此为生的传统读书人前途堪虞。

陈三立亦是浸淫于传统典籍并以古典诗文进行自我表达之一员，作为晚清民初文坛的领袖人物，他对于古典诗文在民初，尤其是“新文学”兴起之后所受到的迫压、所陷入的困窘有切肤之感受。民国六年（1917）“文学革命”提出后，主张白话、反对文言的“新文学家”如胡适、陈独秀等，影响越来越大，在文的方面，他们要打倒“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诗则瞄准陈、郑代表的“近代宋诗”，讽为“贗鼎”，胡适还专门拈出陈三立赞赏沈瑜庆“涛园抄杜句，半岁秃千毫”的那首诗，抨击摹仿古人的“奴性”<sup>⑮</sup>。在“新文学家”的大力砍杀之下，古典诗文的发表传播在1920年前后已经陷入窘境<sup>⑯</sup>。

陈三立似乎没有公开发表专门回应胡适批评的文字，但他在几篇文集的序言里，表明了自己对“新文学”运动的立场。民国十八年（1929），陈三立为陈诗所编《皖雅》作序云：“当盛倡灭古嬗新体之日，大势之所趋，大力之所劫，毅然甘尸呵护残遗、拘犷顽旧之名，不恤时流之訾笑，以孤寄其意。”<sup>⑰</sup>所谓“灭古嬗新体”，即灭弃古体，提倡白话诗文。陈三立对陈诗逆流而上的笃守的赞誉里，寄寓了他自己对“古”诗文价值之认同。民国二十年（1931），他序朱彝《真斋诗存》，态度更加明确：人民国后，不但“斫杀焚劫之祸”长年不绝，而且“邪说充塞，蹄迹纵横，莽莽非人世，其狂逞几欲举古先伦纪道德典籍文字尽摧灭而变易之”<sup>⑱</sup>。对摧灭“古先伦纪道德典籍文字”者，几于骂罹相加。不过，在胡适等人提倡白话

文写作的最初几年里，似乎看不到陈三立的回应，他给别人诗文集所作序言，仍从“知人”“论世”等惯常思路着笔。大概彼时他对于新起的白话文运动及其对于古典诗文的冲击看不大起，以为白话终将自生自灭。但让他料想不到的是，进入20年代以后，白话文运动愈加高歌猛进，以至教育部谕令自民国十年（1921）起，小学教材用白话编写。所以大约在这个时候——也恰是古典诗文发表遭遇窘境的时候，陈三立对“古先”“文字”的未来开始不自信起来。民国十四年（1925），他在序何维栋《十六观斋遗集》时说：“中国效古之文字，苟终不为持异说者所胜，固无忧其覆瓿也。”<sup>④</sup>“持异说者”，主张白话文、反对文言者也。“固无忧”的肯定，因了“苟”字的使用，充满了不确定性。可见此时的陈三立，面对日益鼓荡的白话风潮，显然不能确信“效古之文字”“不为持异说者所胜”的美好未来。但陈三立亦有倔强之处，他相信“凡托命于文字，其中必有不死之处”，“虽历万变万劫，终亦莫得而之死”<sup>④</sup>——这是民国二十一年（1932）陈三立写下的铮铮之语。

从纲纪陵夷到雅废儒衰，再到诗文垂绝，陈三立的信仰世界随着王纲解纽，几尽塌坍灰灭。陈三立许多“犷野激急”之语，其实都隐藏着他精神无依的内在焦虑。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大体可以明白，“民国”在陈三立眼中是怎样的“新邦”，如他所云：

余尝以为辛亥之乱兴，绝羲纽，沸禹甸，天维人纪寢以坏灭，兼兵战连岁不定，劫杀焚荡，烈于率兽。农废于野，贾辍于市，骸骨崇邱山，流血成江河，寡妻孤子酸呻号泣之声达万里，其稍稍获偿而荷其赐者，独有海滨流人遗老，成就赋诗数卷耳。<sup>⑤</sup>

一方面是现实世界的兵战劫杀，一方面是信仰世界的维纪坏灭，即使是“大势之所趋”，又怎能让陈三立在理性和情感上发生认同呢？

所以民国七年（1918）岁初，陈三立大赞康有为批评民国军政乱像、民生凋敝、学术蒙昧等的《共和评议》一书，希望康有为将此书单行，“以极廉价布满海内”，以“收旋乾转坤、事半功倍之效”<sup>⑥</sup>。由此可知，陈三立像康有为一样，觉得中国还没演进到适合实行民主共和制度的时候。再联系陈三立对民国“以暴易暴”的评论、终其

一生不用民国纪年的坚持等，我们大体可以推断：民国之于陈三立，并不是一个可以漠然视之的“他者”，而是一枚深深楔入他身体、令他不适并疼痛的异物，拔而去之的冲动何其强烈！

### 三 作为情感认同的故国

“新邦”既如此，难免“故国神游”。民国初年的陈三立诗文中，“故国”二字常见，当然，其所追忆之“故国”，很多时候是以具体琐细的人、事、场景联缀呈现的。

民国元年（1912）冬，吴学廉邀题《鉴园图》，陈三立因之追忆金陵鉴园：“送老白下居，涉览供幽异。带溪复面山，鉴园久称最。楼栏荫竹树，徙倚浴灵气。主人矧振奇，时时饮文字。野服杂行列，吟啸压歌吹。雪辰或月宵，拏舟乘兴至。平生哀乐怀，掬与染苍翠。隔岁暑未残，孤游坐微醉。暝色合城堞，遥岸绝鸣吠。”<sup>⑦</sup>鉴园为吴学廉所有，在复成、大中二桥间的青溪西侧，距离同在青溪西侧的陈三立头条巷寓庐不远。此园乃陈三立“十载依钓游”之地，竹树成荫，石气流荡，主人时时招饮，诗人多有乘兴，苍翠之中，哀乐寄托。对于《鉴园图》之旨意，同时题词的郑孝胥指以“故君故国之思”<sup>⑧</sup>。而陈三立此时笔下“幽异”“称最”“哀乐”“掬染”的鉴园，不啻他心中“故国”的镜像。像鉴园一样承平之乐的记忆，常常见于陈三立笔端，曾经的胜景欢乐，时时涌上陈三立心头。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追忆往昔的诗里，陈三立往往采用今昔对比的方式来结构诗歌，如鉴园吟啸，以“送老白下居”开忆鉴园文字饮，以“回首酒濡唇”转写现实之窜伏；乃园赏梅，以“昔卧乃园栖山坳”开忆梅下哦赏，以“廿载梦痕不可觅”转写窜居海角；絮漪园醉歌，以“往岁尚书巧穿筑”开忆置酒眺览，以“自逢巨变盗入室”转写时乱；等等<sup>⑨</sup>。陈三立在这些诗歌中，构建了今昔对照的两个世界，他身悬于毫不认同的“新邦”，追想曾有无限欢乐的“故国”，即所谓“句成恋昔还伤今”，彰显的是昨日已逝、欢乐不再的凭吊伤怀，以及虎豹伺前、烽燧满眼的丧乱惶恐。

但“故国”并非仅有“欢乐”一个面相，当



陈三立的追忆上升到国家层面的时候，“故国”遂表现出危机四伏、令人担忧的一面。民国二年（1913）十月，他在《庸庵尚书奏议序》里，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盲目变法、罔顾根本、重臣苟且、曲徇人心的国家图景，这样的国家在更迭变乱、纲维弛坏之后，必将迎来“大命随之”的崩坍之运。而“故国”在变乱中倾覆的原因，除了变法盲目、缓急无章外，民国初年陈三立的反思主要集矢于柄国诸大臣，认为他们“不遏其渐，不审其机，揣摩求合，无特立之节”，要负“十而六七”的责任<sup>⑤</sup>。在他们的把持之下，才干之臣提出救时之策却不见用，甚而至于遭到驱逐，如胡思敬、于晦若、袁树勋等的遭遇。甚至到了民国二十四年（1935），陈三立仍就袁昶庚子中进谏罹难一事引申道：“自庚子之役，剥元气失人心，纲纽解而横议滋，遂有辛亥之变。国之亡也非一端，要其召乱之原基于此。向使忠言见听，获弭巨祸，留公等贞谅谿谿识大体之臣，以匡维政本，消折逆萌，国未必若是其遽覆也。”<sup>⑥</sup>感慨于无砥柱之臣弭祸挽难，忠耿救时之策不得为用。

总而言之，这是一个曾有过欢乐的“故国”，那些深埋在记忆里过往的点滴，令陈三立欢欣并忧虑，产生一种情感认同，他批评、揭露的激愤之词，背后显然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真诚关切。他对“故国”的这种关切和认同，尤其体现在闪烁于纸背的“恢复之志”中。

大约受了吴宗慈《陈三立传略》中“洞察一姓难再兴之理，且以民主共和之政体，为中国数千年历史之创局，与历代君主易姓有殊”、“其甘隐沦作遗民以终老”这一论断的影响<sup>⑦</sup>，似乎无人论及陈三立的“恢复之志”。实则经由剥茧抽丝，不难窥到他恢复旧朝的幽隐之心，民国六年（1917）的“丁巳复辟”，即是绝佳的观察窗口。从目前的各种史料来看，陈三立没有直接参加“丁巳复辟”活动，但我们不能因此想当然地以为他置“心”事外了，只要细读民国六年前后他写下的与复辟诸人相关的诗文，就能捕捉到他“心”系恢复大业的深微之意。

民国六年（1917）前后，为“复辟”一事积极奔走的“故老儒生”中，沈曾植、康有为、李瑞清、陈曾寿、胡嗣瑗、刘廷琛、胡思敬、郑孝胥、王乃徵、顾瑗等，皆是陈三立故友。

沈曾植是“丁巳复辟”的深度参与者之一，丁巳之变当然是其人生大事，陈三立在民国八年（1919）为沈氏所作七十寿诗中，以挥戈挽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誉美沈氏“起衰”“民彝”的复辟之行。康有为事败后幽居美国使馆，脱身至天津后，即赋诗三首写示陈三立，述说复辟遭遇和个人心志；民国七年（1918）元旦，康有为再次赋诗述事明志，有“龙蛇运厄岁云终，半载居幽吾道穷”<sup>⑧</sup>之句，陈三立接诵后立和一首，将康有为比作女娲补天，说他“补天袖满娲皇石”<sup>⑨</sup>。辛亥（1911）南京围城时，李瑞清曾与提督张勋戮力戍守，复辟时虽未及赴京，但得授学部左侍郎。陈三立《清道人遗集序》一方面表彰他身陷围城时的“临危大节”，一方面赞叹他“于故君故国之思，缠绵肺腑，阴求遂其志业，疲奔走，蹈艰阻不悔”<sup>⑩</sup>，后者即指参预“丁巳复辟”一事。陈曾寿复辟后授学部右侍郎，事败后归杭州，陈三立亲往谒访，慰以“至道无亏成”<sup>⑪</sup>；民国十一年（1922）陈曾寿父恩浦卒，陈三立墓志铭中序曾寿官阶云“学部右侍郎”，即复辟所授。胡嗣瑗复辟之意甚炽，“丁巳复辟”后授内阁阁丞，败后归沪，十月初陈三立杭游返宁，过沪时曾往拜访，还金陵后，胡嗣瑗有诗寄到，陈三立酬答之作以“方殷世难人犹在”一句写胡氏劫后犹存，末句“莫举灵樽悟昨非”，乃是劝慰胡嗣瑗不要因为复辟失败而气馁<sup>⑫</sup>。刘廷琛是策动“丁巳复辟”之主力，诏授议政大臣，陈三立在后来所撰廷琛之父刘裔祺的墓志铭里，盛赞刘裔祺平居以“纲常名教，立国大经，凡可扶植而挽救之者，惟力是视，毋计祸害”训子，而刘廷琛依父之教，“终始孤行其志，危苦百折而无所悔惧”<sup>⑬</sup>。所谓“孤行其志”，亦指复辟大业。胡思敬始终主张复辟，并多次参预复辟谋划。民国四年（1915）夏间，胡思敬与刘廷琛相聚于金陵散原别墅，谈起复辟之事，陈三立“力诋”张勋难以成事，不足倚赖<sup>⑭</sup>，又在为胡思敬《匡山归隐图》所作题词里，赞他国变之后，为复辟事“麻鞋几奔走”。民国六年（1917）张勋等人起事时，胡思敬正寓南昌，本拟北上，因闻事败而作罢。应该是鉴于胡思敬一直以来的复辟努力，民国九年（1920）陈三立借为南昌东湖六忠祠撰记之机，盛赞胡思敬有感于辛亥之变“能守死而图报者，仅比凤毛麟角”，在南

昌建六忠祠，将明季六位忠烈之士“悬为法式”，以警动国人，“其意甚痛，其用心甚苦，不复顾有非笑于其后也”，乃今日之“孤臣”<sup>④</sup>。

由上述简单勾索可知，陈三立在复辟事发前后，曾有所参议——他日日与这些“故老儒生”过从，怎能缄默不言？从他对朋辈复辟活动的评述来看，对复辟一事，陈三立是壮其行而痛其败的<sup>⑤</sup>。这一态度，在他为“丁巳复辟”主角张勋所撰墓志铭中得到了集中书写和显现。

癸亥（1923）八月二日张勋去世，次年其子张梦潮等请陈三立为作墓志铭。陈氏所撰之文，颇讲究剪裁布局，如他在志文最后所说：“特著其关兴亡进退孤忠大节以垂示天下万世。”细检此文，可以发现，陈三立于张勋晚清诸事，极其概括，而将笔墨集中于辛亥（1911）到民国六年（1917）的七年间。文章重点写了张勋与维护清政权相关的三件大事：一、辛亥“武昌乱作”之后，率兵固守金陵；二、“国步改”后，为掌握兵权、“复伸其志”，隐忍与袁世凯周旋；三、复辟事起，担任盟主，预盟诸将反戈后，亲率士卒苦战。尤其第三件事的描写，生动如画，在南池子寓宅“苦战不屈”、被挟走时“筋暴皆裂”、“挥刀指前，呼杀不绝口”的张勋，可谓英气凛凛，逼人耳目。铭辞亦专从辛亥之后着笔，表彰张勋的眷顾君国、独支人纪：“大盗移柄，逆施狂走。弛绝纲维，圣法何有。侈侈衣冠，俛眉箝口。文武道尽，孰鞭厥后。挺出异人，夙拥麾旄。叱咤辟易，虎蹲豹哮。摩抚劫运，酣酒而跳。尊主报国，系寐烦劳。贯虹之气，天日为高。故老儒生，凡十馀辈。奔命画策，阴引自助。风埃长驱，拜手庙堂。还我旧物，闾阖辉光。突犯锋车，合众数万。忍尸戎首，喋血进战。抵以孤军，霆击电眩。声震一蹶，寰宇交赞。公伸大义，人纪独支。摭其忠赤，列祖凭依。超然成败，旷世留规。兴起来者，证示刻辞。”<sup>⑥</sup>这是陈三立写过的最好的铭辞之一，铿锵坚劲，肖其人事，同时又饱含感情，深有寄托。民国以来的战乱动荡、纲维弛绝，一直令陈三立骨痛心寒，而张勋所领导的复辟之举，不啻是一场“救赎”行动，虽因集事“仓卒”而失败，但其人“超然成败”，其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品质，可以“兴起来者”。从对张勋复辟一事的注重和颂美里<sup>⑦</sup>，我们是不是可以感受得到陈三立对“还我旧

物”的渴望<sup>⑧</sup>？

其实，不仅是张勋，民初的陈三立十分珍惜“孤忠大节”之士，凡有机缘，必以诗文张之。如“武昌变作”后为保百姓而投井自杀的渭南知县杨调元，陈在所撰墓志铭中，表彰他在“掙解羲纽禹域翻，衣冠污屈徒崩奔”的时刻，能“独酬养士恩”<sup>⑨</sup>。因不屈被斫杀于长沙的狼山镇总兵黄忠浩，陈三立称其为“烈士”，赞他“五运弛纽，依扶人纲。幽趋万蠕，公有耿光”<sup>⑩</sup>。其他如誓死不从程德全独立的左孝同，不“苟全乡里，名遗老自诡”而终身傅保溥仪的陈宝琛等。这些师友于君国大难之际，或以守土而戕生，或性命交关而不屈，或临难不苟全自诡，皆为陈三立眼中的“忠节”之士，“纲纪”之维系者，他们和张勋一样，都将命运与“故国”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而陈三立，通过对这些人物的书写，一方面固然是要表彰“忠节”，树立楷模，另一方面恐怕更重要，即借以表达自己的情志，表达对故国的深沉热爱。

然而奇怪的是，民国六年（1917）复辟前后，从诗歌来看，陈三立与奔走复辟的“故老儒生”过从甚密，但他却置“身”事外。是出于何种想法他做出如此选择？吴宗慈的解释是“洞察一姓难再兴之理”，但细味陈三立诗文，此论殊难服人。而特别遗憾的是，“丁巳复辟”最关键的五、六、七月，陈三立几乎无诗，我们看不到复辟事件进展中陈三立对自己所思所行的即时记录。不过还好，陈三立在丁巳（1917）正月有一组次韵之作，我们可以藉之稍窥陈三立彼时心境。

民国五年（1916）十二月二十九日，胡嗣瑗作成《丙辰除日即事述怀四首》，表达对时局、逊帝、自身、师友等的看法<sup>⑪</sup>。陈三立接读胡诗后，次韵酬答，其第二首最值得注意，诗云：

沉响云空疮雁单，雪痕围诵满辛酸。江边桑茂山河改，梦底松高寝殿寒。群盗横行终自限，中兴作颂待谁刊。茫茫胥溺稽天浸，迸泪何时后土乾。<sup>⑫</sup>

颌联上句用陶渊明“种桑长江边……忽值山河改”之典，写清廷/民国之易世，下句则忧虑逊帝之处境。此即首联所云之“满辛酸”。但诗人自有一种自信：现在横行的群盗终归陨灭，曾经倾覆的王朝必将复兴。“中兴作颂”用元结《大唐中兴颂》一典，以唐肃宗的登基平叛喻指清王朝的基业再



造。肃宗中兴一事，在丁巳（1917）之初成为“热典”。其事起于上年（1916）小除夕沈曾植所得元人朱玉摹唐人《灵武劝进图》，沈氏视为复辟之“奇祥异瑞”，遂以之为题作丁巳元旦试笔，诗以“天回地转中兴图”开篇，以“中兴新数年疆梧”收笔<sup>⑥</sup>。“疆梧”即天干之“丁”，指肃宗收京受册在丁酉年，暗示“丁巳”即为复辟中兴之年。因为沈曾植又邀请沪上瞿鸿禛、沈瑜庆、郑孝胥、金蓉镜、周树模等人同作，《灵武劝进图》一事应在遗老中广为流播，想来金陵的陈三立亦有耳闻，故此“中兴作颂待谁刊”一句，大概有呼应沈曾植视《灵武劝进图》为祥瑞之意。所以，陈三立对复辟中兴是颇有期待的。但是，他又在其它诗中，表现出一种超然疏离的态度。第三首有云：“人物渺然羞湛辈，腐儒袖手看横流。”一方面断言所谓的“人物”都将“湮没无闻”，同时以“腐儒”自视，“袖手”世乱。第四首云：“阅尽虫沙吾亦厌，寻春私恋杖藜轻。”是说阅历太多的战争杀伐，已经憎恶战乱，意欲寻春忘世。综合言之，陈三立出于对历史的通脱理解，宁肯“来作神州袖手人”<sup>⑦</sup>；又因为历睹民国以来的战乱残杀，更向往一种安稳的生活，做一个“世外人”。大概因为这些原因，当复辟来临之时，他满怀热切，却又选择旁观——其实自“戊戌政变”之后，不预政治一直是陈氏的出处原则之一。

#### 四 结语

从吴宗慈所撰《陈三立传略》及相关通信中关于陈三立民国初年立身出处的论断来看，吴氏无疑强化了陈三立与逊清的疏离和对民国的亲和。吴氏如此处理是自觉的，他在传略附言中云：因此文是应乡人“拟请中央政府予先生以褒扬之典”所撰，所以“措词不能不有曲折以达其意者，若于通志之再传，必须另撰，以无负先生之志”<sup>⑧</sup>。所谓“曲折”之处，当即指关于陈三立对“故国”与“新邦”态度立场的论述。既然到了“必须另撰”，才能“无负先生之志”的程度，则其论述之难为凭据，自不待言。

陈三立是一位诗文作家而非思想家，他的诸多想法及书写，具有强烈的现实触发性，所以本文从陈三立民国初年的日常生活感受入手，去追

寻他眼中的世界。尽管早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陈三立已经对“泰西民权之制”有持平之论，甚至断言在庚子国难的形势之下，“民权之说，转当萌芽其间，而并渐以维君权之敝”<sup>⑨</sup>，但对于民主共和的民国，陈三立诗文中，竟然没说过一句好话。除了随处可见的战乱书写之外，陈三立颇多关注纲纪沦落、道消雅废等稍显超越性的问题，所以不少研究者冠之以文化遗民或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称号，但这种标签，容易遮蔽陈三立对故国故君的情感依恋。

从辛亥前到民国后，陈三立对清王朝政治腐败的批判是持之以恒的，但他对自己生长于斯60年的王朝，像历代遗民一样，有一种复杂的热爱。他屡称自己为“亡国”之人，屡屡歌颂忠节之人，歌颂参与复辟的“故老儒生”，都是这种热爱的表现。甚至对于年轻的逊帝溥仪，他亦有“魂依”之志。民国十三年（1924）六月二十四日，溥仪身边的郑孝胥奏请召见陈三立，溥仪允之；陈三立答以“俟稍凉来京”<sup>⑩</sup>。然而不久之后北京局势风起云涌，溥仪避走日本使馆，次年二月移居天津张园。风雨飘摇中，陈三立“面圣”之事于是作罢。但显然，陈三立天凉来京的话并非敷衍——若不想见，拒以衰颓本亦合情合理。所以，民国十四年（1925）十月郑孝胥自沪赴津之时，袁思亮赋诗赠行，陈三立次韵之作除了以“梦存大事将谁待，天鉴孤衷复此行”二句揭示郑孝胥胸怀之外，亦以尾联来表明个人心志：“衰残未逮涓埃报，九逝魂依北斗明。”<sup>⑪</sup>“我”已衰残，未能有涓埃之报，但九逝之魂，每依北斗。“北斗”，溥仪也。在溥仪小王朝的多事之秋，郑孝胥出山，频繁往来于京津、沪地之间，出谋划策，助力颇大，且曾有召见之奏，所以陈三立有“涓埃未报”的愧疚，但他以“九逝”一句，表明了自己“魂依”小王朝的情感立场。

如此看来，陈三立对于自己浸淫其中的传统思想、制度、文化、语言等，极力维护持守，这是他这样的旧时代读书人的信仰认同，安身立命之所在，一旦面对其湮没，自然难免“呜咽”“郁怒”。同时，承载着大半辈子生命轨迹的故国、以及表征故国的君主，他一样热爱，难以割舍。不要说忽略这一点，即使是以思想制度的对应物视之，也未免小觑了作为“共同体”的故国故君身

上所寄寓的陈三立的情感内涵。

[本研究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晚清报刊文献与中国文学转型研究”经费支持,也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指出的问题和提出的修改建议]

- ①胡先骕:《胡步曾第一次来函》,《国史馆馆刊》创刊号,1947年12月。
- ②⑤⑦①吴宗慈:《陈三立传略》,《国史馆馆刊》创刊号,1947年12月。
- ③孙虎:《高不绝俗 和不同流——陈三立与清遗民的心态研究》,《汉语言文学研究》2010年第3期。又参阅氏著:《陈三立“遗民”身份之争与清末民初遗民心态》,《古典文学知识》2010年第3期。“高不绝俗,和不同流”等说见吴宗慈:《第一次复函》,《国史馆馆刊》创刊号。
- ④刘洋:《在民国:逊清遗民的文化心态与诗歌书写》,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 ⑤胡迎建看法与吴宗慈大致相同,见氏著:《陈三立与同光体诗派研究》,第5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张求会、杨剑锋、孙艳则强调陈的文化遗民身份,分见:《陈寅恪的家族史》,第294—298页,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现代性视野中的陈三立》,第183—18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同光体代表诗人心路历程研究》,博士学位论文,第119—126页,苏州大学文学院,2011年。前所提及孙虎文章的最后也落脚于文化遗民的“志道”。
- 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增订本)上册,李开军校点,第395页,第315、316、321页,第338页,第315页,第326页,第334页,第320页,第325页,第323页,第323页,第321页,第321页,第355页,第356页,第336、391、462页,第323页,第34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 ⑭朱兴和:《超社逸社诗人群体研究》,博士学位论文,第57—59页,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2009年。
- ⑰周新国等:《江苏辛亥革命史》,第302—30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 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增订本)下册,第1138页,第1090页,第1064页,第1078页,第1023页,第1090页,第1362页,第1484页,第1033页,第1017—102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 ㉑《陈散原致江西臧抚使书》,《时报》1916年4月10日。
- 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增订本)中册,第837页,第993页,第994页,第932页,第893页,第494、505页,第993—994页,第661页,第909、936页,第537页,

- 第942页,第884页,第561页,第546页,第550页,第1002页,第994页,第925页,第928页,第540页,第844页,第63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 ㉑参见胡思敬:《答陈散原书》,《退庐笈牍》卷四,台湾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退庐全集》本。
- ㉒参见第三节中有关张勋、杨调元、黄忠浩等人物的分析。
- ㉓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1月1日。
- ㉔李开军:《清末民初阅读和批评中的散原诗歌》,李德强编:《清代诗学文献整理与研究》,第260—300页,上海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 ㉕郑孝胥:《题吴鉴泉鉴园图有序》,《海藏楼诗集》,黄坤、杨晓波校点,第23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 ㉖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增订本),上册第342、348页及中册第440页。
- ㉗康有为:《戊午元旦感赋》,《万木草堂诗集》,第43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 ㉘参见王志平整理:《胡思敬致刘廷琛函》,《近代史资料》总第35号,中华书局1965年9月。
- ㉙刘禹生《世载堂杂忆》述及张勋复辟时说:“对郑孝胥,则秘不使知”,“上海方面先商诸子玖诸人,李梅菴、陈伯严、沈子培等,皆谓此事宜大大谨慎,否则皇室待遇,必出奇变”。(钱实甫点校,第136—137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然揆诸郑孝胥日记与沈、陈诗文,此说颇难信从。
- ㉚1920年7月20日,张勋通电,言丁巳之事乃是“感受旧恩,思图报称”,但“止于一击”,现在“但得作太平之民,永拜共和之赐,于愿已足,尚复何求”。(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1835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此电不啻忏悔书,令郑孝胥大为鄙夷,但陈三立墓志铭中按下未表。
- ㉛陈三立此文,笔者曾在《陈三立与沈曾植》(《国学茶座》2016年总第11、12期)一文中进行过分析,因该文之重要性,故不避重复,将分析移用于此。
- ㉜参见胡嗣瑗:《丙辰除日即事述怀四首》,《小说月报》第8卷第4号,1917年4月25日。
- ㉝沈曾植:《丁巳元旦试笔题元朱玉摹唐人灵武劝进图》,钱仲联校注:《沈曾植集校注》,第1011—1014页,中华书局2001年版。
- ㉞陈三立:《高观亭春望》,《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潘益民、李开军辑注,第82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 ㉟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008、2010、2011页。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马勤勤